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 一种比较制度分析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田野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 一种比较制度分析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田 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一种比较制度分析 /

田野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

ISBN 978-7-5097-9951-2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国际合作-研究 IV.

①D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8648号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

——一种比较制度分析

著 者 / 田 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浩敏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25 字 数：231千字

版 次 /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951-2

定 价 / 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陈 岳

副主编 时殷弘

编委会委员（按拼音排序）

陈新明 陈 岳 方长平 金灿荣

李宝俊 庞中英 宋新宁 时殷弘

本书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成果

总 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逐步“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国家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到中心，中国与世界关系高度相互依赖，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日益增强、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复杂认知和期许相伴而生。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仍然缺失或不足；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国遭遇外部世界的风险也愈加突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和矛盾也有所增多。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国如何认识和看待外部世界，特别是随着中国崛起的态势日益明朗，中国应该如何认识自己过去的发展，如何定位自己的未来角色，如何回应国际上的要求和期待，如何应对各种不同的国际挑战？种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也使一个处在改革开放时期和崛起时代的中国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更迫切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筹划、组织了“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系列丛书，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史、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实践等领域，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也有西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还包括对重大现实问题，如金融危机、能源安全、国际冲突等问题的关注。丛书作者大都是我院中青年学术骨干，这套丛书是他们在自己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上述成果经过我院学术委员会的推选，将陆续列入出版计划。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增进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拓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这套丛书选题基本涵盖了理论、历史和问题研究等领域，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特色。基于近 60 年的学术传统和历史经验，历经数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和长期积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成为具有国内领先地位和较大国际影响的国际问题教学研究基地。

学科优势明显，学科特色突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战略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美国问题研究等领域确立了全国优势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领域。近年来，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夯实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对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结合成为人大国际关系研究的鲜明特色。这既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时代的呼唤，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成熟的必然需求。

国际关系学科最早形成于一战后的英国，二战后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包括国际问题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重心移到美国。美国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使得国际关系理论逐步摆脱了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影响，越来越受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越来越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必然要求我们的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但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学术兴趣和视野，总是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局限。无论学者们怎样竭力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中立，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方向都与国家所面对的外部局势、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的政治需求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在理论的价值中立和现实服务之间保持平衡，推动知识生产和服务社会双重功能的实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

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原“985工程”）的支持，对此我们也深表谢意。

学无止境。由于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尚属年轻学科，丛书作者又多是中青年学者，作者们的观点难免有偏颇甚至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丛书编委会

2015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史进程 /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7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13

第二章 国际合作中的制度设计：概念与理论 / 18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观念 / 18

第二节 国际制度的概念 / 22

第三节 国家为什么要在国际合作中设计制度? / 28

第四节 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模型 / 34

第五节 国际制度选择的交易成本模型 / 37

第三章 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设计 / 42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42

第二节 既有的文献及其不足 / 44

第三节 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的演变 / 47

第四节 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合作中的
交易成本与制度设计 / 53

第四章 APEC 和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设计 / 7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71

第二节 既有的文献及其不足 / 74

第三节 APEC 与 CAFTA 的制度化水平比较 / 77

第四节 中国参与 APEC 和 CAFTA 的交易成本与制度设计 / 81

第五章 “10+3”机制与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 / 99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99

第二节 既有的文献及其不足 / 102

第三节 “10+3”机制和东亚峰会在制度设计上的特点 / 106

第四节 区域合作中的问题与区域性制度设计的差异 / 111

第五节 “10+3”机制与东亚峰会的联系及中国的 地区战略 / 122

第六章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设计 / 127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27

第二节 既有的文献及其不足 / 129

第三节 中美在经济沟通领域中的制度形式 / 132

第四节 中美经济合作中的问题与双边对话机制的设计 / 140

第七章 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 / 156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56

第二节 既有的文献及其不足 / 159

第三节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 162

第四节 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下的预期行为模式 / 168

第五节 基于中国 1982 年至 2013 年双边投资协定的经验检验 / 171

第八章 结论 / 179

参考文献 / 185

后 记 / 204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下，中国主要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因此，二战后由美国领导构建的国际制度体系把中国拒之门外。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开始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交往。进入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开始参与国际制度。从1971年至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可以大致分为5个阶段。

一 初步参与国际制度：1971—1978

1971年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11月23日，中国代表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①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仍对作为美苏两霸对抗舞台的联合国充满着疑虑和怀疑。一个重要的反映就是从1971年11月24日到1976年12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中弃权或者不参与表决的次数在总表决次数中所占的比例高达39%。^②在这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内仍扮演着某种“局外人”的角色。

在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也陆续参加了作为联合国下属机构或者专门组织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万国邮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23页。

^② 牛军主编《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6—37页。

政联盟等。中国由此开始了与世界各国在各功能领域的合作。

不过，由于中国在这一时期并未走出闭关自守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仍无意参与国际经济制度。比如关贸总协定（GATT）在1971年11月16日决定取消台湾的观察员地位。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和外贸部起草了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认为GATT“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进行对外贸易扩张和争夺世界市场的工具”，而且参加GATT“不便于我国对各种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国别政策”，因此建议“目前暂缓参加”。^① 在中国国内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仍没有开放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当时的确不可能提出加入GATT的申请。

二 部分参与国际制度：1978—199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真正开启了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进程。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同年5月15日，中国在世界银行及其所属的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此外，中国于1982年获得GATT观察员身份。1986年，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和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的成员。

同时，中国开始尝试参与军控、人权等领域的国际制度。1979年和1980年，中国先后参加了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和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1984年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后又陆续参与了防止核战争、禁止外太空军备竞赛、禁止化学武器等议题的审议。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

在加入这些国际制度的初期，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适应国际制度的规则上。中国加入这些制度后，大都会遵守它们已有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通常符合中国的利益。^② 中国开始尝试运用这些国际规则来支持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享受作为成员国的权利。比如，1980年，IMF首次向中国提供了4.5亿特别提款权第一档信贷；1981年，中国又获得了3.05亿

^① 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历程》，人民出版社，2011，第19—21页。

^② [美] 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26—67页。

特别提款权的优惠信贷；1986年，IMF再次向中国提供了约6亿特别提款权的信贷。1981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金额为2亿美元的贷款。到1989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年贷款量已增至13.5亿美元，共支持了12个项目的建设，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卫事业和扶贫事业的发展等多个方面。

尽管中国在这一时期参与了大量的国际制度并且初步运用了既有的制度规则，但从整体上讲在各类国际制度内仍是比较消极和被动的。由于对国际制度规则仍缺乏深刻的理解，中国很难提出建设性的倡议来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此外，这一时期中国参与的国际制度在其规则上大都不要国内政策的重大变革，因此这种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参与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相当有限的。

三 全面参与国际制度：1991—2001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的国际环境极度恶化。中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制度的方式，缓解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更加积极地寻求加入国际制度，并且主动地学习、运用国际规则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由于中国还游离在全球性的贸易组织之外，无法以GATT成员国的身份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合作、解决贸易争端。在此背景下，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可以视作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一种次优选择。同时，APEC成员包含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入APEC可以缓和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APEC能够为中美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对话提供重要场所，有利于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1991年，在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同时加入。随后，中国积极参与了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曾在1996年、1997年和2001年三次大幅度削减关税，平均关税水平从1995年的35.9%降到了2001年的15.3%。^①2001年，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面对骤然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峰会机制初步形成，并在1999年启动了“10+3”财经合作机制。

^① 中国历年IAP, <http://www.apec-iap.org/>, 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1月19日。

此外，2001年2月，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的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正式成立。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层次的经济合作还是难以完全满足中国的利益，中国必须寻求加入全球性贸易体系。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中国争取“复关”的行动也随之转为争取入世的进程。在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WTO的问题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WTO排除了最重要的障碍。次年5月，中国与欧盟间的协议达成。自1986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中国为复关和入世进行了长达15年的努力。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此外，中国还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公约和协定。比如，1993年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6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还在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这一时期，中国加入了诸多具有重要分配涵义的国际制度，实现了对多边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特别是加入WTO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完全一员”。为了获得参与国际制度带来的收益，中国不得不付出相应的成本，特别是需要进行国内政策的相应调整。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来权衡参与国际制度的成本和收益。

四 建设性参与国际制度：2002—2008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扩展，国家实力不断加强，也更加熟悉国际体系的运行规则和秩序。这使得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制度体系中，并逐步在体系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

加入WTO之后，中国认真行使各项权利，积极参与WTO的各项活动，不仅切实履行入世承诺，还发挥着建设者的作用。到2009年，中国在入世8年后已经全部履行了国内市场开放方面的所有承诺，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中国建立起了符合WTO要求的法律体系，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①并且，在贸易争端中，中国较好地执行了WTO的裁决，维护了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与世贸组织：回顾和展望》，<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ae/ai/201007/2010070703724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1月19日。

WTO 的权威性。同时，中国在 WTO 机制内推动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在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地参与了区域层面的国际制度建构。2000 年 11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2 年 11 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随后，货物、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投资协议相继达成，2010 年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10 + 3”机制下达成的“清迈倡议”。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建立了 800 亿美元的东亚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更加制度化、多边化。

2001 年 6 月 15 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作为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主导国，中国积极促进该组织内部的合作，并不断提高合作的制度化水平。2004 年 1 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成立。2005 年 11 月，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间联合体在莫斯科正式成立。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10 + 3”机制下东亚金融合作的制度化等一系列区域合作的成就都是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实现的。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已经开始具备了设置议程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从规则的接受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过渡。

五 重构国际制度：2009 年至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传统地位遭到削弱。相比较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坚挺，为国际经济的复苏做出了突出贡献。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随之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转制”、“改制”和“建制”成为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的新特点。^① 中国在参与和改造既有国际制度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构建新的国际制度。

第一，转变既有国际制度。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完全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在 2009 年的匹兹堡峰会上，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被正式制度化，新兴国家得

^①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 238 页。

以共同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政策制定。这标志着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8”向“G20”的转变。对中国而言，G20 是中国首次以创设者和核心成员的身份参与到全球经济的治理机制中。此后，中国在 G20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在 G20 伦敦峰会上，中国提出向 IMF 增资 500 亿美元；第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提倡加强金融监管；第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 G20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2016 年 9 月，中国作为主席国首次承办 G20 领导人峰会。在中国的倡议下，杭州峰会创造了 G20 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各方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第一次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强调综合运用好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第一次制定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开启了 G20 制定多边投资规则框架的新里程；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就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①

第二，改造既有国际制度。除了转变既有的国际制度外，改造不公平的国际制度，也是克服既有国际制度弊端的方式之一。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希望提升 IMF 在金融治理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010 年 11 月，IMF 执行董事会就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根据该方案，中国的份额占比将增加 2.398% 至 6.394%，投票权将升至 6.07%，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至第三。另外，2010 年 4 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世行新一阶段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从 2.77% 提高到 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

第三，建立新国际制度。尽管通过转变和改造的方式，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作为后来者，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这些机制的主导权。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国际制度，使国际秩序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基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共同利益，2009 年 6 月，金砖四国首脑在俄罗斯举行首次峰会，并发表共同声明，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作为该机制中的主导国，中国积极推动它在国际金融改革中的作用，并不断提升它的制度化水平。2011 年 4 月，金砖国家达成《三亚宣言》，在推动国际经济改革上达成广泛共识。2014 年 7 月 15 日，金砖国家峰会发表《福塔莱萨宣言》，宣布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初始资本为 1000 亿美元，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① 罗建波：《G20 杭州峰会给世界贡献了什么》，《光明日报》2016 年 9 月 15 日，第 04 版。

2013年10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2014年10月24日,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此外,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2014年11月举行的APEC北京峰会批准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标志着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

从整体上看,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从利用规则寻求自身利益,到主动参与制度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再到转变、改造既有制度和建立新制度。这种渐进的参与方式与中国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熟悉程度相关,更与中国的综合实力提高紧密相连。中国通过融入国际制度,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促进了中国实力的增长;而利益的拓展与实力的提高,又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基础和动力。正如国际制度理论的奠基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注意到的:“随着实力的增加,中国与现有多边主义制度的互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一方面中国广泛加入多边主义制度,寻求在其中更大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中国也尝试创建新的多边制度来实现国家利益,比如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①正是在这一渐进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设计国际制度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对外政策课题。

第二节 文献回顾

作为观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不仅使中国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日益增加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鉴于其间潜藏的众多研究机会,“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近年来成为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题域。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首先表现为对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史描述。这类文献多从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外交实践入手,为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发展划分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描述,并总结相关经验。20世纪80年代末,张历历在文章中就尝试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分为3个阶

^① [美] 罗伯特·基欧汉:《竞争的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20页。

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0年，新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努力。第二阶段从1971年到1978年，此阶段多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类组织建立关系，和国际经济、贸易、文化组织的联系还比较少。第三阶段从1979年到1987年，这一阶段不仅和国际政治组织发展关系，更加强了和经济、金融、贸易、青年、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类的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①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三阶段划分被更新为四阶段划分，对各阶段的特征总结也更加明确。^② 例如门洪华将新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分为相对孤立（1949—1970年）、消极参与（1971—1978年）、部分参与（1979—1991年）、全面参与（1992年至今）四个阶段。^③ 除此之外，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数字统计也是历史视角下的研究的组成部分。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为代表，一些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重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条约的数据统计情况，并将其与他国及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为讨论现实问题和对华战略提供经验支撑。^④

历史的视角是对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门性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此基础上，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既有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加入既有国际制度。现阶段，关于中国加入既有国际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在西方，这类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在资深一代中国问题研

-
- ① 张历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载渠梁、韩德主编《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7—74页。
 - ② 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104—106页；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7—22页。
 - ③ 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8—22页。
 - ④ [美] 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10页；[美] 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48—53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其他相关研究可参考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p. 47. Xinyuan Dai and Duu Ren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Limits of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2, 2016, pp. 177–197;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52—261页；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107—114页。